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三編

林慶彰主編

第13冊

王充命運論研究

葉淑茵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充命運論研究／葉淑茵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

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2+16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三編；第 13 冊）

ISBN：978-986-254-797-7（精裝）

1.（漢）王充 2.學術思想 3.命運

030.8

101002164

ISBN-978-986-254-797-7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三編 第十三冊

ISBN：978-986-254-797-7

王充命運論研究

作 者 葉淑茵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3 月

定 價 十三編 26 冊（精裝）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王充命運論研究

葉淑茵 著

作者簡介

葉淑茵，台北市人。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碩士、英國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哲學碩士、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現為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私立高苑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著有〈王充與老子論「自然」之比較〉、〈王充「自生」概念對裴頠與郭象「自生」概念影響之探究〉、〈葛洪對王充形神思想反省與發展之研究〉、〈葛洪論神仙與聖人之研究〉、〈葛洪的神仙思想其名教與自然的調和〉、〈有君與無君的世紀大論辯——葛洪與鮑敬言的辯論〉等單篇論文。

提 要

先哲前賢對「命運」的問題有所感受，且訴諸於筆墨者不勝枚舉。相較於中國其他哲學家，對自己受命運作弄談論最多的首推王充。他以自身不順遂的遭遇為出發點，以大量的篇幅感嘆命運對人的限制。由於王充對命運與人生的關係所提出的解說是先秦至東漢所未有的，但後人對其言命的目的、立場、意義、方法及定位皆不甚清晰和偏頗，故其命運論的特色更難以彰顯。本論文即逐一深入探究，並詳加評析和檢討，以期能還王充命運論原來的面貌。此外，對於中國的命運論發展，鮮少有人作出全面的整理，因此作者亦透過王充命運論的研究，整理先秦至東漢、魏晉南北朝及宋朝少數學者對命運的看法及言命的模式，以供喜研命運者參考。



目

次

第一章 前 言	1
第二章 王充之生平及時代背景	5
第一節 生 平	5
一、家世背景	5
二、性 格	6
三、求學過程	8
四、仕宦經歷	9
五、著 作	10
第二節 時代背景	12
一、封建制度的昌盛	12
二、元氣說的流行	13
三、星象學的發達	15
四、漢代的命運觀	17
第三章 中國命運論的發展及王充命運論的思想淵源	21
第一節 先秦時期命運論的發展	21
一、《詩經》、《書經》的命運觀	21
二、《左傳》、《國語》的命運觀	23
三、孔子的知天命	25
四、墨子的非命論	28
五、孟子的立命論	32
六、莊子的安命論	35
七、荀子的制命論	39
第二節 兩漢時期命運論的發展	43
一、《淮南子》的命運論	43
二、董仲舒的命運論	45
三、揚雄的命運論	48
四、班彪的〈王命論〉	51
第四章 王充命運論的形上根源	55
第一節 「天」與「氣」	55
第二節 「氣」與「命」	59
第五章 王充論命運的態度與方法	63
第一節 王充論命運的態度	64
第二節 王充論命運的方法	66
一、類比法	68
二、演繹法	68

三、歸納法	69
四、典證法	70
五、譬喻法	71
第六章 命運的字源及王充對命的分類	73
第一節 命運的字源	73
第二節 命的分類	74
一、人 命	74
二、國 命	79
第七章 命與人生的關係——遇、遭、幸、時、偶、骨相的作用	83
第一節 「遇」與「命」	84
第二節 「遭」、「幸」與「命」	87
第三節 「時」與「命」	89
第四節 「偶」與「命」	92
第五節 「骨相」與「命」	94
第八章 王充命運論的轉折——「命則性也」	97
第一節 「性」的來源及「性」的內涵	98
第二節 「性」與「命」的關係——「命則性也」、「性與命異」	102
第三節 性可變易的人性論	107
第九章 王充命運論的評估	117
第一節 王充命運論的價值	117
第二節 王充命運論的影響	119
第三節 王充命運論的檢討	123
一、命運論形上根源的檢討——元氣說的檢討	124
二、論命運的方法的檢討	125
三、偶然、必然與自然三者相互混淆的檢討	128
四、疾虛妄效率的檢討——星氣、骨相、國命的檢討	130
五、命運論內容局限的檢討	131
六、命運論定位的檢討	132
七、性與命的檢討	133
第十章 結 論	135
參考書目	137
附錄：王充與老子論「自然」之比較	143

第一章 前言

在莎士比亞的著名戲劇《羅密歐與茱麗葉》中，羅密歐爲求自衛，殺了世仇凱普雷特（Capulet）族人提伯爾特（Tybalt），因而成爲亡命之徒。此時，他就深覺自己是命運的傀儡，而說自己是「受命運愚弄的人」（fortune's fool）〔註1〕。人的一生中，難免會遇到自己所無法掌控的情況，總會思索這些無法掌控的事件成因，進而思索「命運」、人生是否受限制等相關問題。而一般大眾，在不順遂、而又百思不得其解時，不都以爲自己受到命運的愚弄，而有相似的感嘆？

在傳統中國哲學中，先哲前賢對「命運」的問題有所感受，且訴諸於筆墨者，實在不勝枚舉。如孔子說「知天命」、孟子說「立命」、莊子說「安命」、荀子說「制命」。他們在闡述命運的同時，卻也肯定人的力量能突破命的困境，換言之，在命運的束縛下，人也有自我發展的空間。

相較於中國其他哲學家，對自己受命運作弄談論最多的首推王充〔註2〕。他以自身不順遂的遭遇爲出發點，以大量的篇幅感嘆「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註3〕在「莫不有命」（〈命

〔註1〕 參見朱生豪譯，《羅密歐與茱麗葉》（臺北市：世界書局，1997年10月初版五刷），頁114。

〔註2〕 張永儒主講，謝仁真整理，〈命理與義理〉，收錄於《哲學雜誌》（臺北市：哲學雜誌編委會，1993年1月），第三期，頁12。

〔註3〕 王充著，蔡鎮楚注譯，《新譯論衡讀本》，共二冊（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0月初版），冊上，〈命祿〉，頁31。本論文所引用《論衡》的文字，皆根據此版本，只註明篇名，不另加註。

祿》)的前提下,王充又一再強調「命不可勉」(同上),因此其命運論往往被定位為「命定論」,甚至被斷定為「徹底的命定論」〔註4〕。又由於他在《論衡》中處處顯露自己對不順遂的遭遇無法釋懷,而在試圖找出原委時,他卻把自身的際遇完全推給命,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他的命運論只是替自身的遭遇自圓其說及辯解〔註5〕。如此一來,王充的命運論自然難以獲得正面的評價。

不可置否,王充是利用著述來反映及抒發自己的不幸遭遇,然而他對生命卻也有「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自紀〉)的體認,因此對自己有「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同上)的深切期許,並希望藉「垂書示後」(同上)達到此目的。如果王充只是消極的談論命運、怨命,一味的以命運為人生遭遇的主宰者,全面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試問他如何能「名傳於千載」?

因此,本論文以王充命運論為研究對象的動機與目的有以下三點:

- 一、王充對命運與人生的關係所提出的解說是先秦至東漢所未有的,但後人對其言命的目的、立場、意義、方法及定位皆不甚清晰和偏頗,故其命運論的特色更難以彰顯。本論文即逐一深入探究,並詳加評析和檢討,以期能還王充命運論原來的面貌。
- 二、對於中國的命運論發展,鮮少有人作出全面的整理,因此作者透過王充命運論的研究,整理先秦至東漢、魏晉南北朝及宋朝少數學者對命運的看法及言命的模式,以供喜研命運者參考。
- 三、人在面對困境時,難免思索命運存在與否的問題,也因此期望能透過王充對命運的看法,重新反省命運的實質意義,以了悟命運與人生的關係,而在面對困境時,不再徒然感嘆自己是「受命運愚弄的人」。

〔註4〕如陳拱、黃國安、黃雲生、陳叔良、陳正雄等學者,在探討王充的命運論時,都將之視為「命定論」。而陳拱更明白指出王充不只言命,更進一步的發展「徹底的命定論」。參見其所著,《王充思想評論》(臺中市:私立東海大學,1968年6月初版),〈自序〉,頁5。黃國安亦以為王充的命運論,是徹徹底底的命定論,沒有伸縮改變的可能。參見其所著,《王充思想之形成及其論衡》(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11月二版),頁123。

〔註5〕陳拱即以王充因為過於執著於人生負面無常的結果,以致未能透悟人生之正面,因此造成其「內有所傷、外有所疾」的生命風格。參見其所著,《王充思想評論》,〈自序〉,頁9。言下之意,即是認為王充並未真正體會人生真義,其命運論只在抒發他對人生無常的感受,並替自身的遭遇自圓其說及辯解。

而本論文研究的進路則可分為下列幾點：

- 一、由於王充談論命運，不僅在於感嘆自身不順遂的遭遇，更要反對當時「行善得福，行惡得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命運觀，因此他對命運的看法及談論命運的立場，與其生平及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係，是以先從王充之生平及時代背景著手，以了解其命運思想產生的原因。
- 二、王充的命運論並沒有明顯的淵源，因此透過析論王充以前諸多先哲前賢對命運的探討，一來可了解先秦至西漢命運論的發展，二來藉此可了然他對前人的取捨從違，以掌握其命運論的淵源。
- 三、王充命運論的根源及其論命運的態度與方法不僅異於以往的學者，並且反映他整個哲學思想的特色，因此亦以專章探討王充命運論的形上根源及論命運的態度與方法，以凸顯王充命運論獨樹一幟之處。
- 四、王充對命運的內容作了詳細的規定，並以「遇」、「遭」、「幸」、「偶」、「時」等概念與命的關係對人生的遭遇作了詳盡的說明。職是之故，對這些概念彼此之間關係的釐清，便是掌握王充命運觀點的關鍵。
- 五、在「性」與「命」合一的基礎下，王充「命不可勉」的命運觀點出現重大的轉變。所以透過「性」與「命」關係的探討，以對王充命運論的定位有所釐清。
- 六、最後，作者即以王充命運論的價值、影響及檢討三方面作全盤的評估，進而了解命運對人生的意義與吾人面對困境時所應有的態度。

第二章 王充之生平及時代背景

一個哲學家思想的形成，必然受其所學、遭遇、性格及時代背景等等外在因素所影響。徐復觀先生即認為，王充個人的遭遇對其思想之影響在古今中國思想家中相當少見，而他更進一步指出，王充的遭遇限制了他展望時代的眼界〔註1〕。陳拱先生也主張，王充一生的遭遇對其思想影響甚大，他的重要觀念及思想，都是以自己的真實感受或體會為基礎，尤其是他的命運觀，更是如此〔註2〕。由此可知，王充的生平及時代背景是了解其命運論的重要關鍵，以下即分別闡述之。

第一節 生 平

王充，字仲任，東漢會稽上虞人（今浙江省上虞縣）。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西元 27 年），卒於東漢和帝永元年間。他的生平主要記載於其所著的〈自紀〉，及范曄《後漢書·王充傳》中。但范曄將王充與王符、仲長統二人合卷並列，有關王充本人的記載，僅有寥寥的二百多字，而〈自紀〉則文長數千言，對他的生平有較完整的論述。以下即根據〈自紀〉、《後漢書》及相關資料，詳細析論王充的生平，以了解其生平與他的命運論有何關聯。

一、家世背景

在〈自紀〉中，王充自述其家世云：

〔註 1〕 徐復觀著，《增訂兩漢思想史》，共三卷（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 9 月再版），卷二，頁 563～564。

〔註 2〕 陳拱著，《王充思想評論》，〈自序〉，頁 4～5。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眾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王充的祖先原是魏郡元城人，幾代因有戰功，被封於會稽陽亭。一年後，因王莽篡漢而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及爵位，於是居於陽亭，改以農桑爲業。此時，正值凶年，生活艱困，但王充的祖先卻因承襲軍人的性格而橫行霸道、好勇鬥狠，以致結怨過多，不容於鄉里。因此其祖父王汎被迫舉家遷至會稽錢塘（今浙江杭縣），改以經商販賣爲業。到了王充伯父及父親那一代，不但不改祖先意氣用事及任性的個性，反而變本加厲地到處惹是生非，最後又與豪家丁伯等結怨，不得不再次舉家遷移至上虞。王充便在此地出生。

仲任祖先原受封官爵，但卻失官，進而務農，而後經商。家道每下愈況，自然無法與大族豪門相較。不被鄉里所容，造成不斷的遷徙，自然沒有族黨可資憑藉。難怪他會自認爲是出生低微的「細族孤門」（〈自紀〉）。

祖先的叛逆性格及細族孤門的家世背景，對王充的性格和仕途的進陞都造成巨大的影響。畢竟，在講求世襲門第的封建社會裏，像他這樣的家世背景而想進身仕途是不太可能的。仲任本身受父祖性格影響所養成的自負、剛毅性格，也使他不易獲得進陞的機會。在家世及本身性格的雙重影響下，仕途自然不順遂；仕途的不順遂更直接影響王充對命運的看法。

二、性 格

王充被視爲中國思想界的「異人」，其特殊、異於同儕的性格，在幼年時期便凸顯出。〈自紀〉云：

爲小兒，與儕輩遊戲，不好狎侮。儕儔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

仲任年幼時，恭敬有禮、沉默寡言，並深受父母、鄉里的稱讚。但他孤傲自矜，不願與同輩伙伴一同遊戲。

及其年長，他清高莊重，對交友特別謹慎，不與庸俗低劣的人打交道，也不與志趣不投的人交談。〈自紀〉云：

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對談，非其人，終日不言。

充爲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

當遭受批評時，仲任總是無情的加以反擊，從不輕易讓步。當別人嘲笑他的文章過於通俗時，他以「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閭巷之樂，不用《韶》、《武》」、「牛刀割雞，舒戟采葵」（〈自紀〉）等話反唇相稽。當別人嘲諷他的文章過於詭異時，他也以「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同上）來辯駁。可見王充是個不服輸，且能言善辯的人。

在朝爲官時，王充仍不改自負傲慢的性格。他「眾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同上），更自喻爲美玉、明珠，認爲「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同上），而以「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同上）自許。如此的個性與爲官態度，仕途自然無法一帆風順。

面對不順利的仕途，仲任試圖表現出不爲名利富貴所牽絆的君子風度。他說：

不好微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同上）

但他自負、不服輸的個性，卻讓他無法完全超脫於名利之外。在二次仕途受阻後，他利用著述來反映自己的不幸遭遇，更冀望藉由著作來「名傳於千載」（同上）。王充的命運論就在他想要跳脫功名，卻又無法跳脫的矛盾中蘊釀而出。〔註3〕

總之，不管是在交友、對人、對事及寫作等方面，在在都顯出王充自負、剛毅、不認輸的性格。這種性格影響他的現實生活及面對自身遭遇的態度。因此，在仕途受阻，遭受冷落後，便把遭遇完全歸咎於命運，並將本

〔註3〕 康保延著，《王充天人思想研究》（出版地不詳：祥生出版社，1979年初版），頁10。

身對命運的不滿訴諸筆墨，加以抒發，形成了中國哲學史上獨樹一幟的命運觀。

三、求學過程

有關王充的求學過程，〈自紀〉中有頗明晰的記載：

爲小兒，與儕輩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

仲任自幼聰慧，表現異於同儕，在學業方面出類拔萃，而言行也沒有任何的過失，可謂品學兼優。在離開故鄉的私塾後，他遠赴洛陽，求學於當時著名的史學及今文經學家班彪。當時仲任因家境貧困，沒有經濟能力買書，但仍不放棄求知的熱忱，經常到書店閱讀。由於他有過人的記憶力，過目即能記誦，因此在幾年間便博通諸子百家之言，奠定了深厚且廣博的學問基礎。〔註4〕

雖然仲任曾求學於班彪，卻「不守章句」（《後漢書·王充傳》），不受當時學術風氣所影響。在「經明德就」（〈自紀〉）後，便辭謝了班彪，以自身廣博的學問爲基礎，獨立從事專門的學術研究。在他的命運論中，屢見仲任旁徵博引，以歷史、古聖先賢的言行證明自己的理論，這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爲學態度，實深受其師的影響。而仲任對國家命運的看法，也秉承班彪的觀點。〔註5〕

〔註4〕 楊家駱主編，范曄撰，《後漢書》，共六冊，冊三，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頁1629云：「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臺北市：鼎文書局，1974年10月初版）本論文所引用《後漢書》的文字，皆根據此版本，只註明書名及篇名，不另加註。此外，對於王充是否曾師事班彪的問題，可參見徐復觀著，《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566～569。

〔註5〕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共五卷，卷二，頁264云：「王充之師事班彪，不但見於記載，爲歷代學人所共信，即就思想上來看，王充也多少保留著班彪的影響。此可以由〈治期篇〉與〈王命論〉的比較而證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一版）

四、仕宦經歷

王充由洛陽回鄉後，先以教學維生，後來才走向仕途〔註6〕。他的仕途並不得意，一生只出仕二次，官職也只有掾功曹及從事二類官職皆不高的職位。〈自紀〉云：

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

這是王充的第一次出仕。由於王充本身「不好要微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自紀〉）的處世態度，且多次與郡守諫爭，最後終於因意見與郡守相左而去職。〔註7〕

在第一次仕途失意後，王充便「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後漢書·王充傳》），專心著述。《論衡》一書便是在此時完成。到了東漢章帝元和三年，王充再次入仕。〈自紀〉云：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

此時王充的官職爲治中，也就是治中從事史，主要的職責在於爲民伸冤、檢舉與彈劾官吏。對於一個自視甚高的人來說，自然會認爲這樣的工作是「材小任大」，不適合自己。他自負、不苟俗的個性，使他在任內經常得罪他人，受人排擠，無法得到任何進陞的機會。因此，在章和二年，便憤而辭官。

之後，雖然受到謝夷吾的推薦而被肅宗徵召，卻以老病爲由，加以拒絕〔註8〕。此時王充已年近七十。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書生苦讀一輩子，無非想謀得一官半職。聰慧、博學、清高的王充卻「仕數不耦」（同上），在官場上無法一展長才。這樣的遭遇，可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及打擊，更導致其後半生在沒有朋友、沒有子女依靠照顧的情況下窮苦潦倒的渡過。而自負、剛毅的性格，讓他認爲仕途的不順利，並不是自身的才能及品德不及他人，而是由於外在的客觀因素所致，因此，眼見別人飛黃騰達時，他便自怨自艾，將人的富貴榮華歸咎於難以掌握的「命運」。〈自紀〉即云：

〔註6〕《後漢書·王充傳》云：「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註7〕同上云：「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

〔註8〕《後漢書·王充傳》云：「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對於徐復觀先生對此點的駁斥，可參閱其所著，《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569～574。

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因此，王充在論析有關命的問題時，自然帶有極濃厚的消極悲觀色彩。

五、著 作

依據王充《論衡》〈對作〉及〈自紀〉二篇的記載，其一生的著作共有：《譏俗節義》、《政務》、〈備乏〉、〈禁酒〉、《論衡》及《養性》。

（一）《譏俗節義》

共十二篇。〈自紀〉云：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眾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此書是在王充第一次結束仕宦生涯後，有感於世態炎涼而作。其目的在於揭露當時攀炎附勢、忘恩負義的社會風氣。期望透過通俗的語言，讓世人覺醒。

（二）《政務》

在《譏俗節義》之後，王充又撰寫了《政務》一書。〈自紀〉云：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

此書針對政事，向官吏倡言治民之道，提出意見，期「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對作〉）

（三）〈備乏〉、〈禁酒〉

此兩篇本爲王充呈遞給上級的奏章。在奏章不被上級所接受而退回後，將草稿加上標題，成爲〈備乏〉及〈禁酒〉二篇。〈對作〉云：

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